

【烟火人间】

温暖的名字

□杨丽丽

我没有小名,也从没正经起过大名。出生以后奶奶随口喊了一声“丽丽”,就成了我的名字,这既是大人们口中的“小名”,也是伴我一生的大名。

那时村里的娃大多是这样,名字不用费心思琢磨,田埂上瞥见啥,灶台上撞见啥,随口一喊就定了终身。有的叫狗娃,图个好养活;有的叫麦穗,应着地里的收成;我这“丽丽”,许是奶奶那年春天在院子一角栽了丛野蔷薇,花开得艳丽,喊我时便沾了花的灵气。没人想着要再为我添个“大名”,户口本上登记时,村文书问奶奶我叫啥,奶奶笑呵呵地说“丽丽”,这两个字便顺理成章落上了纸页,成了我唯一的名。

奶奶喊我从不用高声,粗粝的手掌在围裙上擦两下,朝着院子里疯跑的我扬一扬:“丽丫头,回家喝米汤喽。”声音裹着灶烟的暖,慢悠悠飘过来,我即便正跟伙伴们在麦垛上打滚,也会立刻从蓬松的麦秸里钻出来,裤脚沾着草屑往家跑。米汤是搪瓷碗盛着的,上面飘着几粒煮得软糯的玉米粒,奶奶在一旁看着我喝,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花:“慢点喝,没人跟你抢,我们丽丫头要长高高。”她从没叫过我别的,仿佛这个名字就是我天生的标识,刻在她心里。

后来我上学了,老师拿着花名册点名,念到“丽丽”时,我噌地站起来,声音脆生生的。同班有个邻村的丫头也叫丽丽,老师便笑着区分:“以后我就按照你们年龄大小,喊你们一个大丽丽,一个小丽丽吧?”我听后觉得很亲切——原来这名字不光属于我,还沾着乡里乡亲的熟络。放学路上,扛着锄头的大伯远远望见我,嗓门洪亮:“丽丫头放学啦?你奶奶在家蒸了红薯。”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的大婶也会抬头笑:“丽丫头,过来给婶子说说,学堂里学了啥新字?”没人问过我的“大名”,因为在他们眼里,丽丽就是我的大名,是喊着顺口、听着暖心的名。

村西头的老槐树是听这名字最多的地方。夏天的傍晚,大人们搬着竹椅聚在树下乘凉,我和伙伴们围着树干追逐打闹,叽叽喳喳中总能传来奶奶的声音:“丽丫头,慢点跑,小心摔倒了”“丽丫头,来喝点水”——我便放慢脚步,坐在奶奶身边,小口地喝起奶奶为我准备的蜂蜜水。奶奶一边为我打扇一边絮絮叨叨:“丽丫头,你看你跑得满头大汗,一会可别这么疯了。”风吹过槐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在应和奶奶的念叨。

一年秋天,我跟着父亲去镇上赶集,遇到了父亲的老同学。那人笑着问父亲:“这是你家丫头?大名叫啥?”父亲刚要开口,我抢先说:“我叫丽丽,这就是我的大名。”父亲笑着拍了拍我的头:“对,就叫丽丽。”那人也笑了:“这名字好,干净又响亮。”那天镇上人多,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,可我总觉得,没有比“丽丽”更顺耳的名字了。它就像村里的土坯墙,老井水,朴实又亲切,喊一声就带着烟火气的回应。

我长大了,去了城里读书、工作。城里人初听我叫丽丽,会愣一下:“这是大名还是小名?”我笑着说:“既是大名也是小名,我就这一个名。”他们便会赞叹:“真特别,比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字好记多了。”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名字本身就带着故事,懂的人自然懂。

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,可村里的长辈们依旧亲切地喊我丽丫头。每次回家,他们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,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:“丽丫头,城里过得好不好?”“丽丫头,啥时候再回来看看?”我知道,这个名字里藏着他们对我的牵挂,藏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。它没有大名的正式,却比任何正式的名字都承载着更纯粹的情感;它没有华丽的字眼,却比任何精致的称谓都让我安心。它就像一根线,一头连着我,一头连着生我养我的村庄,连着那些爱我的人。

【私房记忆】

母亲的腌萝卜

□刘昌宇

寒冬腊月,当北风呼啸时,我总想起母亲腌的萝卜。那口粗陶罐子立在灶台角落,像位沉默的老者,守着岁月熬出的咸香静默不语。母亲的手艺是祖辈传下的,萝卜经她之手,便有了魂。

选萝卜是头等大事。霜降后的萝卜最甜,母亲总在天未亮时挎着竹篮往菜地跑。她蹲在田埂边,手指轻轻叩击萝卜缨子,像在听诊。“这棵瓷实,甜。”她挑的萝卜个个滚圆,青皮上沾着露水,切开来,莹白的瓢子透着水灵。邻居张婶总笑她:“老李家的萝卜,比选女婿还仔细。”母亲只抿嘴笑,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温柔。

洗净的萝卜要晾足时辰。母亲把萝卜切成半指宽的条,码在竹匾里,摆在院中晒着。冬日阳光稀薄,她却说:“晒足三天的萝卜,腌出来才脆。”我蹲在匾边,看萝卜条渐渐失了水汽,边缘微微卷曲,像老人干瘪的嘴唇。母亲不时翻动,动作轻得像怕惊醒了什么。有次我偷吃一条,她佯装生气:“小馋猫,晒不干就腌不脆!”可转身又塞给我一块麦芽糖。

腌萝卜的盐是自制的。母亲把粗盐炒热,混入花椒、桂皮,在石臼里捣成细末。这活计需耐心,她总说:“盐要细,才入味。”我蹲在旁边数她捣盐的次数,数着数着就困了,头一点一点,撞在石臼上。母亲便用沾着盐末的手点我鼻尖:“小懒虫,又偷懒。”那盐香混着母亲的体温,至今留在记忆里。

腌制的日子选在月圆夜。母亲说月光能吸走萝卜的涩气。她将晒干的萝卜条一层层码进陶罐,撒一层盐,再铺一层萝卜,如此反复。最后封罐时,她总要念几句我听不懂的“咒语”,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。封好的陶罐放在灶台边,每日早晚各开一次,用干净筷子翻动。这活计母亲从不假手他人,说:“手上有汗气,腌萝卜会坏。”

头三天最难熬。萝卜在罐里发酵,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响,像在说话。我总凑近罐口闻,却被母亲轻轻拍开:“小鼻子,闻多了会打喷嚏。”她每日擦拭罐身,动作虔诚得像在供奉神明。第四天清晨,她揭开罐盖,一股咸香扑鼻而来,夹着淡淡的甜。母亲夹出一条,咬得“咔嚓”作响:“成了!”那声音清脆如裂帛,在我心里荡开涟漪。

腌好的萝卜呈琥珀色,透亮如水晶。母亲总在饭前切一盘,摆在青花瓷碟里。萝卜条上泛着油光,咬一口,先是咸,后是甜,最后是辣,三种滋味在舌尖交织,最后又和谐地融为一体。父亲就着萝卜喝粥,能喝两大碗。我则喜欢把萝卜条卷在煎饼里,咬下去,“咔嚓”一声,满口生香。母亲看我吃得欢,眼角的皱纹便舒展开来,像绽放的菊花。

有一年冬天,母亲病了。她躺在炕上,还惦记着腌萝卜。“罐子该开盖了……”她虚弱地说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却总不得要领。腌出的萝卜要么太咸,要么太软,没了那股脆劲。母亲尝了一口,没说话,只是默默吃了半碗粥。第二天,她硬撑着爬起来,重新腌了一罐。她的手抖得厉害,撒盐时洒了一地,却固执地不肯让我帮忙。那罐萝卜腌好后,母亲的脸颊凹陷下去,像干瘪的萝卜缨子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,母亲总在包裹里塞几包腌萝卜。我拆开油纸,咸香便扑鼻而来,室友尝了,都说好吃,问我在哪买的。我骄傲地说:“我母亲腌的。”咬一口,咸香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甜,那是母爱的味道,是任何添加剂都调不出的深情。

去年春节回家,发现母亲不腌萝卜了。她说:“老了,手抖,腌不好了。”可我知道,她是怕我吃多了伤胃。我偷偷翻出她的陶罐,发现罐底积了一层盐霜,像岁月的痕迹。我学着母亲的样子,腌了一罐萝卜。母亲尝了一口,眼睛突然亮起来:“脆!真脆!”她像个孩子似的笑了,眼角的皱纹里盛满骄傲。

如今,母亲的腌萝卜成了我记忆里的珍宝。每当我咬一口,咸香便在舌尖绽开,那味道里,有阳光的温暖,有月光的清冷,有灶火的炽热,更有母亲一生的温柔。这世间的美味,终不过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牵挂,是岁月熬出的深情,是永远割不断的亲情。

母亲的腌萝卜,腌的是时光,是爱,是永远都尝不够的家的味道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“加急航班”

□丁展

前几天在书店听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关于《四大名著》的讲座,苗教授妙语连珠的讲解令人沉醉。散场后走在回家的路上,那些幽默的讲解在脑子里打转,忽然就撞进了一段回忆里——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朱先生。他上课也是这股子劲儿,课堂里永远飘着笑声。我后来爱读爱写,多半是源于他。

算来二三十年了,可关于他的那些趣事,还是一闭眼就清清楚楚。那时候朱先生已是副校长,却不离教学一线。最绝的是朱老师讲文言文,再拗口的句子到他嘴里都活了。记得讲《扁鹊见蔡桓公》,他把古文拆成家常话,讲到“桓侯体痛,使人索扁鹊,已逃秦矣”时,他忽然戛然而止,脖颈青筋微露,双臂平举作螺旋桨状,嘴里“突突突”模拟直升机轰鸣,末了一拍大腿:“瞧见没?扁鹊这是坐加急航班跑的,晚一步就得背锅!”全班笑得前仰后合。这“加急航班”的梗,我们笑了一整个学期。

讲《少年闰土》时更有意思。读到刺猹那段,朱老师干脆从讲台后走出来,眼睛瞪得溜圆,右手攥成个小拳头当钢叉,胳膊一伸一收,活脱脱就是课文里“项戴银圈,手捏一柄钢叉”的模样。那股机敏专注的劲儿抓得极准,我们坐在下面,仿佛真看见月光下的瓜田,闰土正屏气盯着猹。如今再读这篇课文,脑子里还是他当时的样子。

朱先生上课特别投入,常常讲得忘了时间。有时候下课铃响了,他浑然不觉,我们也听得入迷,没人舍得打断。有一次,夕阳斜照门框,把生物老师的影子拉得老长。这位生物老师早已站在门口多时,大概是看我们全班都听得津津有味,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在门口等。最后还是朱先生自己板书时瞥见了,赶紧停住,连连作揖道歉。生物老师笑着摆手的样子,至今想起来仍觉温暖。

后来,朱先生的女儿考入北京大学。我家中至今还挂着他当年送我的一幅毛笔字,用的是颜体楷书,力透纸背,落款格外有趣,写着“北大女生之父”,每次看到都忍不住笑。这么多年过去,字的墨迹淡了些,但先生传递给我的文字生命力,却在岁月里愈发清晰。那位站在讲台上模仿刺猹、喊着“加急航班”的先生,从来没在我心里淡去过。他让方块字有了心跳与体温,让遥远的篇章住进了我们的生活。这份最初的、生动的欢喜,或许便是文学与教育最本真的模样。